

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1946年4月，盟军总司令部（GHQ）获悉，东京的剧场有位艺人自弹自唱具有颠覆意味的歌曲。侦探们前去观看演出，结果大为震惊。他们听到了这样的歌词：“引诱日本女人很容易，只要巧克力和口香糖。”更令人震惊的歌词是：“每个人都在讲民主，但是有两个天皇我们怎么可能民主？”一句歌词竟然同时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美国人取缔了这个节目。¹

身处演艺剧场圈外的无数日本人都可以证实，这绝不是占领当局偶然的举措。他们以审查机关审阅这个国家新的自由，深入到了公众表达的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很快学会了识别新的禁忌，并且相应地采取自我约束。人们知道向终极权力挑战，没有什么好结果。

通过1946年10月的所谓“权力者崇拜”事件，作者和编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天皇——麦克阿瑟将军的神圣不可侵犯。《时事新报》针对麦克阿瑟受到的阿谀奉承发表了一篇温和的社论，警告“过去两千年来一直浸染日本人心理的统治者崇拜”。社论因麦克阿瑟传记的出版畅销，以及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向报纸杂志汹涌投书而起。在这些来信中，人们以裕仁天皇的专用语来形容麦克阿瑟，将他描绘成“活生生的神”、“密云冲破”现“天日”，乃至“神武天皇再生”。《时事新报》的评论，随后在英文版的《日本时报》（*Nippon Times*）上发表，其部分章节如下：

政府是由卓越的神、伟人或者领袖强加于国民的，如果这个观

念不加以纠正的话，民主政治迟早会破灭。我们担忧，在麦克阿瑟引退之后，我们还会找到某位活着的神，为我们带来曾经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独裁政治……日本国民感激麦克阿瑟战后在日本的贤明统治以及对日本民主化的努力之方式，并非是将他作为神来礼拜，而是应当抛弃奴性心理，获得不向任何人低头的自尊。

尽管这一不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议论，在发表前得到了 GHQ 当局的认可，但是其英译转载却立即被美国宪兵队扣押。命令是民间谍报局局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发出的，理由是“很不得体”，而且有损于占领军与最高司令官的声望。² 这是极端保守派威洛比罕见的公开的权力展示。同时，他以高压手段的介入，暴露了审阅制度的日常控制状态，显示出占领军对所谓“左翼”言论乃至对美国政策极微小批判的控制的强化，成为民主化议程严密计划与调控本质的象征。

幽灵官僚机构

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9 年 9 月，审阅制度通过 GHQ 内部精心设置的机构执行，并且继续变相实施直到日本恢复主权。占领初期曾预定，实行此项控制直到确保外国驻军安全以及改革政策成功贯彻之际。1945 年 9 月 10 日，盟军最高统帅首次发布关于“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正式指令，明确宣布“应当对言论自由施行绝对最小的限制”，只要言论表达坚持“真实”，不妨害“公共治安”。³

实际上，审查机构很快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在民间谍报局内的民间审阅部（CCD）名下产生了交错蔓延的官僚机构。民间审阅部的审阅官们受到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内“积极的”民主推进派的强力支持。⁴ 审查范围覆盖各种媒体形态与表演形式：报纸、杂志、普通书籍、教科书、广播、电影以及包括古典艺术在内的各种戏剧。⁵ 巅峰时期，民间审阅部在全国各地的审阅官超过 6000 人，绝大多数是会讲英语的日本人，他们识别可疑的资料并且加以翻译或者概括，然后提交给上司。直到 1947 年末，许多出版物，包括近 70 份主要日报和所有的书籍杂志，在正式出版之前都要接受审查。仅民间审阅部的出版·演艺·播送处

(PPB)，月平均审查材料数量之巨，高达“报纸 26000 号，通讯社刊物 3800 份，广播稿 23000 本，印刷快报 5700 份，杂志 4000 期，书籍和小册子 1800 种”。在 4 年的监控过程中，CCD 审阅官还抽查了 3 亿 3 千万件邮件，监控了 80 万次的私人电话通话。⁶

被审查的对象，既包括日语资讯也包括外文资讯。对外文资讯的审查，意味着日本人不得准许阅读胜利者掌握的所有信息。美联社与合众国际社的电讯，有时在翻译成日语之前，都要经审查确认是否“安全”。譬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这样的专栏作家的文章，被美国各大报业辛迪加争相采用，但是在横渡太平洋之后也遇到了同样的障碍。全面的审阅活动，最终产生了关于禁止事项的一长串清单。而最具极权主义色彩的是，这些事项包括禁止公开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审查制度确立伊始，编辑和出版者就都接到了如下秘密通告：

1. 此通告之目的，在于确认本审阅局管辖区域内之全体出版者达成共识，不得公开有关审阅手续。
2. 全体出版者应当明了编辑出版物时，不得出现任何关于审阅 408 的具体暗示（例如涂黑、空白、粘贴覆盖、文句不完整、使用 ○○、×× 等），以及其他不易明确理解的符号。
3. 不得发表涉及审阅人员或者行动的评论。此规定不仅适用于有关新闻出版物的审阅，亦适用于有关广播、电影和演剧的审阅。
4. 不得出现例如“通过审阅”、“占领军出版许可”或者任何其他提及、暗示 CCD 审阅的字样。

既然审查制度的存在从未被公开承认，因而在 1949 年末，审查制度随民间审阅部的解体，也就悄无声息地终止。正如幽灵一样，民间审阅部的官僚组织，在“不得发表有关民间审阅终止之报道”的秘密告别方针下，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⁷

与当初审查制度将很快逐步停止的期待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审阅部的监控，反而变得更加严厉而琐细。在这一点上，投降约一年后对刊载“权力者崇拜”评论报纸的扣押事件，昭示了盟军司令部审查政策的强硬，以及对旨在排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初衷之背

离。在民间审阅部历任数份要职的罗伯特·斯伯尔丁（Robert Spaulding），后来谈到威洛比的行为带来了三重后果：它导致了 CCD 审阅官的增员；在审阅官中培育出了极端谨小慎微的心理；并且导致繁杂的“检查”手续蔓延，使得 GHQ 各个部门的人员，加紧了对新闻言论的控制。⁸

尽管占领当局的审阅，绝不像日本投降前 15 年间实行的审查制度那么普及和压抑，但是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从太宰治（《斜阳》的作者，1948 年自杀引发轰动）到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都尝过作品被审阅官蓝铅笔删改的滋味。令小说家谷崎润一郎震惊的是，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彻底被查禁，查禁理由竟然是因为作品是“军国主义的”。谷崎应当感到与有荣焉的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日译本，也受到了 CCD 审阅官的质疑。然而，即便是中村光夫这样辛辣的文艺评论家，也在占领终结之后得出结论，尽管战后日本的文学大多没有什么价值（中村认为性的描写过多），但是总体上作家享有了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得多的自由。⁹

对战败前和战败后不同的审查制度都有体验的新闻记者，对战后的“自由”不那么乐天派，但是通常也承认征服者较为手下留情。稳健派月刊《文艺春秋》的原编辑池岛信平，表达了被甚至不懂日语的人审阅的反感。但是他也承认，GHQ 的监控比起日本军部的高压还差得远，彼时一旦越界就可能性命攸关。¹⁰ 左翼杂志《改造》的编辑者松浦总三，是民间审阅部注意的目标。他写过一部有名的关于占领时期审阅制度的著作。松浦觉得，即使是在严酷的“赤狩”后期，美国人吹毛求疵的审阅，也绝不像帝国主义的日本“天皇制专制主义”那样压迫深重。同时，他将 1948 年到 1951 年视为曾经受到占领当局鼓舞而又希望幻灭的进步和左翼作家的黑暗时代。¹¹ 广播节目的制片人间或说起美国人监督下漫长的间隔时期，“依然是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某些方面比战时管制“更加麻烦”，至少在自家思想警察的审查下，他们不必为接受审阅官审查而将广播脚本翻译成英语！¹²

盟军总司令部高官敏锐地认识到，他们达成民主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要讲求微妙的平衡。起初，审阅政策更积极强调言论自由和解除政府对媒体的控制。10 月 4 日盟军最高统帅颁布《人权指令》之后，编辑

和出版者受民间情报教育局召集，被鼓励积极进取地阐释这一“基本法”。他们被告知，与过去相反，现在允许批评政府、议论天皇制甚至支持马克思主义。¹³ 然而，这将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因为胜利者的审阅制度，有时就是以离奇的方式复制先前帝国政府镇压“危险思想”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残害着战后的民主。实际上，在向作者和出版者传达《人权指令》的同时，新闻界就被逐渐置于民间审阅部的出版物审阅制度之下，并且完全明白了现在需要遵守的新禁忌。 410

禁止披露审查制度自身存在的审阅政策，反映出美国人的伪善，并且使之在与军国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旧制度对比中相形见绌。直到 1930 年代末，仍然允许文本的删除部分，在发表时以○○或××标示。至少战前的读者知道某些内容被删除了。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计算○○或者××的数目推测其意。因而有些经历过这两种审查制度的作者，在评价盟军最高统帅版的“表达自由”时大加嘲讽，显然不足为奇。有一位引用古老的成语，比喻最高统帅部的伎俩为“作茧自缚”；另一位则不计前嫌地评论说，至少战时日本内阁情报局的审阅官，还会给被审查者倒杯茶喝。¹⁴

不容许的表达

对出版、广播、新闻报道、电影和文学创作的从业者而言，最高统帅部审查的实际操作并不透明，使得如何把握不触怒新思想警察的界限十分具有挑战性。这部分是由于民间审阅部审阅官的操作，基于从未公布过的有关禁止事项的秘密议事录。换句话说，不容许表达的确切标准，并未传达给那些受审阅者。结果是，参与任何形式的公开交流者，不得不依靠两种模糊暧昧的指标，来判断什么内容不被允许。一是，占领之初数月间最高统帅部发布的有关出版、广播和电影的相当概括的“法规”：“新闻必须严守真实原则。不得发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妨害公共治安的报道。不得对同盟国进行虚假或者破坏的批评”，等等。二是，借助经验的想象。就是说，在审阅官迄今所准许表达的内容基础上，推测什么内容可能通过审查。¹⁵ 这不仅容易误入歧途，而且一旦错误地估计审阅官的容忍限度，还会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这种状况培育出了令人不安的流言氛围，很容易使人陷入病态的自我审查。

民间审阅部作为月度清单的秘密记录，随政治动向的变化而改变。初期，它们包括 30 多件禁止事项。1946 年 6 月，民间审阅部的秘密记录中全部的“删除和禁止出版的对象类别”，包括如下事项：

411

批判 SCAP

批判军事裁判（即东京战犯审判）

批判 SCAP 起草宪法（包括任何涉及 SCAP 担当的角色）

言及审阅制度

批判美国

批判苏联

批判英国

批判朝鲜人

批判中国

批判其他同盟国

对同盟国的全部批判

批判日本人在满洲的待遇（指日本投降后，苏联人和中国人对日本战俘或者平民的处置）

批判同盟国的战前政策

言及第三次世界大战

评论苏联与西方各国的对立

拥护战争的宣传（表现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战争中的行为辩护的宣传”）

神圣国家的宣传

军国主义的宣传

民族主义的宣传

赞美封建的价值观念

宣传大东亚共荣圈

全部的（日本）宣传

对战争罪犯的正当化或拥护

亲善（尤其是指同盟国士兵和日本女性间的性交往）

黑市活动

批判占领军

对饥饿的夸大

煽动暴力或社会不安（在实际审阅的材料上，常记作“扰乱公共治安”）

虚假报道

不适当地言及 SCAP（或地方军政部）

发表尚未解禁的报道¹⁶

当审查印刷校样时，审阅官用蓝铅笔删改有关章节，同时附上一张 412 标准表格，简单提示这些章节有违数十项出版规定中的哪些项目，然后将涂改得令人心烦的材料交还给出版者。¹⁷ 这样一来，琢磨被删除内容的具体性质，成了日本人揣测占领当局不明确的法规指令之真实意图的主要手段。回顾起来，有些脱离常轨甚至荒唐可笑的审阅官审查过度的事例，竟然成了受审阅的一方判断战胜国容许表达的界限的标准。

正如这些内部清单所示，不容许表达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不得批评战胜的同盟国（当初包括苏联在内）或者最高统帅及其政策。这意味着在 6 年多的时间里，最高权力机构一直超越责任而存在。敏感的社会问题，比如日本女性与占领军士兵的性交往、涉及占领军的卖淫、混血儿，更不用说包括强奸在内的美军士兵的犯罪行为，都不得谈论。公开评论冷战的紧张气氛，起初也是被禁止的。甚至对黑市严肃的批评分析，大致也在被禁之列。不得对“封建的”价值观表示赞赏。任何类似于战争年代宣传的观点表述，皆为禁忌。

占领伊始，对胜利者而言，控制对刚刚结束的战争的议论，自然极其重要。他们认为，关键是要压制任何可能重燃日本人战时暴力热情的煽动言论，以防危及占领军人员安全或者动摇占领当局的改革计划。美国人还主动出击，认为有必要教育一般国民认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暴行的方方面面，而此前，这一直被日本本国的审查机构所压制。

这是一项合乎情理的使命，一项艰巨的挑战，也是一件微妙的任务。因为它有将被征服者的宣传简单置换为胜利者的宣传的危险，实际上最终也未能幸免。之前所有谈论战争的方式，都成了不正确和不可接受的。对战胜的同盟国战前政策的批判，被全面禁止。所有过去的宣

传，似乎都有违新闻报道的规则。即便见仁见智而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对日本发动战争之时世界局势的议论（大萧条的冲击、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保护主义与独裁政治的世界趋势、欧美帝国主义的榜样和压力以及对抗种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泛亚主义思想），也被视为既煽动社会不安定因素，又有悖于“真实”，遑论对占领军政策及诸战胜国的批判。

当然，现在的“真实”，是同盟国一方的战争见解。新闻报道不得不以遵命发言或者保持沉默来予以响应。出版者和广播电台，被要求按照总司令部尤其是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的授意发表看法。不得对战犯审判进行批判。这意味着，正如机密目录所示，不得公然“正当化或拥护”被作为战争罪犯起诉的人物。与此相反，尽管东京审判的被告有指定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媒体被要求不加批判地支持检方主张和法官的最终判决。

最高统帅部的战犯审判活动，对日本人心理的去军事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同盟国的A级战犯审判，以卷帙浩繁的证据和口头证言，最有效地揭露了隐藏阴谋与暴行的历史。这些是绝好的反面教材，但是透过审阅机构，它们也给予了媒体和一般大众一些不那么值得肯定的教训：例如，不得质疑法庭的构成和操作，而且被告将被推定有罪除非被判无罪。在法庭之内，被告的辩护人被允许申辩日本的领导人是在追求合法的国家利益，而“胜利者的正义”对这些行为有根本的偏见。而在法庭之外，媒体既不被准许支持这样的主张，也不被允许批判审判未能在更大范围内起诉更多的战争领导人。同样自相矛盾的是，日本国民从对战争的了解中获益匪浅：他们认识到，审阅制度和自己国家政府的机密都是不允许民众参与的，同时也都不许民众自由议论。

然而，有关战争的不容许表达的内容范围更广。不用说战时泛亚主义和针对“支那匪贼”、“鬼畜米英”的圣战宣传都不可容忍，与此相伴的对“大和民族”优越性的赞辞也不得出现。至于公开谈论死、破坏、败北也大有问题。在这里，审阅制度甚至妨害了合理的、有治愈作用的对悲伤的表达。公开面对广岛和长崎之意义的困难，最为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

书写“原爆”体验并未被明确禁止。投降后一两年间，尤其是广岛周边的地方刊物，发表了许多作家关于“原爆”的散文和诗作。然而与

此同时，像永井隆这样的幸存者发现，他们初期的著作被查禁，许多与原子弹爆炸有关联的作品，被大幅删削。有关原子弹爆炸最动人的英文作品，是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Hiroshima*）对6位幸存者的素描，在1946年8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时，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虽然日本媒体对此有所提及，但是直到1949年之前，其日文译本都未能出版。“原爆”体验是禁忌主题的说法传播开来，直接的审阅制度和广泛的自我审查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原爆”体验书写的完全消失。直到1948年末，永井隆的著作出版，标志着“原爆”文学的姗姗来迟。在这样的状况下，“原爆”的幸存者发现，想寻求彼此的安慰或是告诉他人核战争对于人性的意义，都极度困难。除此之外，公然的审查延伸到了科学著作。许多关于原子弹爆炸和后继的核辐射影响的报告，直到占领终结之际才得以公开。在6年多的时间里，日本的科学家和医生，甚至包括一些在广岛和长崎从事放射性影响研究的美国科学家，竟然无权使用他们所需的档案资料，从而无法与“原爆”受害者沟通并且帮助他们。¹⁸

“原爆”破坏的视觉记录，甚至被更为彻底地屏蔽。1945年8到10月间，大约30位日本摄影师组团在广岛和长崎拍摄的纪录片，于1946年2月被美国人没收并送往华盛顿，而且被严令不得留一个拷贝在日本。¹⁹直到1950年，才首次有绘画呈现原子弹爆炸对人的影响。画家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当时出版了一本小画册，收集了他们对广岛见闻的描绘（标题为《ピカドン》，是特指“原爆”的术语，字面意义为“闪光—爆炸”）。同年，丸木夫妇还获准展出了令人悚然动容的题为《幽灵》的绘画，此画作成为丸木夫妇合作、强力描绘“原爆”受害者的系列壁画（《原爆之图》）的首幅作品。丸木位里后来解释说，他们夫妇作画的动机，是担心对“原爆”破坏的恐怖经验，永远不再会有本土
415
的视觉记录。²⁰直到占领终结之后，1952年8月原子弹爆炸7周年之际，一般国民才有机会看到有关广岛和长崎灾难照片的展示。正因如此，唯一的核战争体验国的国民，在核时代的早期岁月里，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原爆”的后果更为无知，也更有自由公开讨论它们的意义。²¹

在同盟国看来，日本人完全是自食其果。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为顶点对日本城市的恐怖轰炸，被视为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向

他国所施暴行的正当报复。1949年初，当占领当局最终缓和对“原爆”感受的个人叙述的出版限制，他们的确流露出“正当惩罚”的意识。在威洛比准将的坚持下，永井隆的《长崎の钟》初版本，被迫附录了美方提供的有关1945年日本军队“马尼拉大屠杀”的长文。这样的胜利者逻辑是愚蠢的。因为这很容易被当作暗示，揭示出长崎和马尼拉暴行的相似性，这可不是美国人的初衷。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家人亲友的死亡和他们自身所受的苦楚，都是应得的报应。²²

公开表达悲痛之情、哀悼和称扬死者的要求，有时会超越审阅官容许的界限，这也不足为奇。最有名的例子，是前帝国海军少尉吉田满写的哀婉的散文诗。吉田从东京帝国大学应征入伍，在注定毁灭的超级战舰“大和”号上服役。1945年10月中旬，受痛苦灵感的强烈激发，吉田详细叙述了1945年4月驶往冲绳途中，“大和”号与近三千官兵葬身海底的记忆。吉田百感交集，他希望从记忆中抹去对战友们无谓的牺牲的印象，将他们从耻辱中解救出来，纪念他们的忠诚和勇气，哀悼死者，而且像任何国家的海军士兵一样，向伟大战舰的沉没默哀。

23岁的吉田也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为何死亡夺去了如此众多战友的生命却没有选择他。作为“大和”号上的少数幸存者之一，此外还作为船桥上最后战斗始终的目击者，吉田以写作此文为己任，实际上是在同时书写战斗报告、讣告和悼文。其结束语如下：

乘员数三千余名，生还者仅二百数十名。至烈之斗魂、至高之炼度，其死也天下愧之。²³

吉田满的《战舰大和ノ最期》（《战舰大和之末日》），现在被公认为日本战争体验产生的少数重要的文学记录之一。当时的审阅官承认其感人的质量，却担心这种对“日本军人精神”的个人召唤，可能诱发读者悔恨和报复之念。结果，此书在1946年和1948年两度被禁，只在1949年中出版过删节版，直到占领结束后才发表全文。

比《大和》更为温和审慎、将战死者作为悲剧的牺牲者公开悼念的行为，也遭到非难。1948年中，审阅官从长与善郎的一篇小说中删除了

如下句子：（据审阅官译文）“目前的状况，她不可能为失去唯一的宝贝儿子而公然哭泣或是表达哀思，她的儿子在所罗门群岛的海战中光荣战死。”审阅官举出的理由是“对占领军进行批判”。²⁴ 同年早些时候，诗人矢野又吉题献给他孩子们的歌集，其中多数诗歌未能获得审阅官的许可。矢野很晚才知道，他出嫁的女儿战后在满洲饿死，他的儿子则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死于苏联人之手。他的许多诗歌都因“反苏”情绪被查禁。他的一首俳句，提到将儿子的生命“献给胜利，绝非是献给战败”，结果被认为是“右翼宣传”。在另一首俳句中，他感叹“战败之鞭太严酷”，质问道这些年轻人何罪之有，则被审查为“煽动社会的不安”。²⁵

著名诗人壶井繁治，引起了审阅官们更为复杂困惑的反应。审阅官们用蓝铅笔删削壶井出版的诗集。除了删除描写孤独、饥饿的人们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蜂窝”中呻吟以及战士战斗、死于“纯血色的旗帜”之下的诗句外，审阅官还面临一首题为《历史》的诗作带来的尴尬，原诗未加标点，译文如下：

旗坠地
从收音机中
神的声音传来——
空洞、颤抖、哀伤
此刻必定被记入历史

虚假创造的神话之页
今日闭合
人民的眼睛重新睁开
直视周围的现实

惨淡的废墟之街
尸体已被移走无迹可寻
只有怨恨残留
怀抱业火中毙命之人的怨恨
杂草在废墟上蔓延

417

八月十五日之上重叠起八月十五日

亡国者

与将重新建国者

一年间的激战

三百六十五日的历史

流入明日的时间

明日的二十四小时

充实历史的时间

(后略)

这或许既是诗人本人也是审阅官不能确定的象征，审阅官们只否决了诗作第三段的“历史”，而保留了开头将天皇呼为神的提法，以及第四段对“亡国者”的暧昧的暗示。²⁶

另一方面，审阅官们在完全否定有才华的女诗人栗原贞子的《握手》时，却毫不迟疑：

“哈罗，美国兵”

小军国主义者们大声叫道

扔掉了他们的玩具枪

直到昨天

他们还在忙着玩战争的游戏

“哈罗，美国兵”他们叫道

在他们小小的心中

突然涌出

对未知民族的渴望

“哈罗，美国兵！

昨天是你们在跟我们的父亲打仗吗

但是你们朝我们笑得多么灿烂啊

你们一点儿也不像是

大人教我们相信的魔鬼”

我们想摸摸你们的大手

我们想跟你们握手²⁷

有时，审阅官对触及战争之语的反应异常过敏，简直缺乏头脑。川端康成小说中，偶尔提到一位特攻队员之死的部分被查禁。同样，广受欢迎的坂口安吾的一篇短文，赞赏自愿为国捐躯者的爱国热情，希望受挫沉沦的老兵们现在把这种无私的精神转化为和平的动力，也被以“军国主义的”理由查禁。审阅官以“民族主义宣传”为由，将下面这段朴素、自然的话从英语教科书中删除：“如果战争教会了我们和平的价值，那些我们今天仍怀念的人就没有白死。”下面这首俳句，歌咏的是在遭受轰炸的都市地区人们种植蔬菜的常见景象，被以“批判美国”的罪名查禁：

烧毁的菜园
街边雨水敲打着
嫩绿的菜叶

一本少年杂志的文章，以长崎土地上萌芽的植物，来比喻年轻人投身于废墟之上新日本的建设，基于同样的理由被删除。

下面的这首诗也被认为是越轨之作：

就像是一个遥远的，遥远的梦
我们挥舞一元二十钱的竹枪
对抗巨舰和大炮

1947年，一位美国记者在天主教杂志《コモンウィール》(Commonweal)上发表文章，认为这首短歌被查禁的具体事例，是最高统帅部审查过敏的典型例证，认为实际上这些谨慎适度的诗句，恰好反映了“现在的日本人嘲弄自身政治和军事不成熟的倾向，从常识和人性的观

点看来，这都是值得表扬的态度”。这一批判，激起了民间情报教育局新闻出版处主任丹尼尔·伊伯顿（Daniel Imboden）的猛烈反击。他认为，日本人是“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国民”，并疾呼“感谢上帝，麦克阿瑟将军建立了审阅制度”。²⁸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所用术语的变更：日本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旬引入，是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主义的行为，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服者自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净化胜利者

一旦涉及对占领当局和同盟国的批判，审阅官们有不少事例是接近荒唐可笑的。拍摄占领军行进的照片要删去画面中的一只小狗，理由是有损于部队的尊严。更常见的是，军队本身以及一切军队的象征物（吉普车、英语标识之类）都被从视觉记录中删除，似乎从影像资料中消去占领的印记，就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日本人忘记他们失去主权的事实。²⁹ 由于被查禁，公众无缘看到一幅描绘美国大兵占领东京的惊人效率的漫画，作为这小小压制行为的后果，他们也无缘得见那惊人的评论标题“口香糖的无穷威力”。审阅官甚至也不允许公众阅读这样机智诙谐的川柳（一种诙谐讽刺的俳谐诗）：

只有吉普车
似乎沐浴着五月
明媚的阳光³⁰

另一层面上的压制，是数年来禁止媒体直接提及日本政府必须支付的巨额占领军维持经费，此项经费通常高达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1946年，新闻界一旦必须言及占领军经费，即被要求以“终战处理费”呼之。翌年，遵审阅官之命，此项支出，更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预算中的“其他”费用。³¹“不许批评占领军”的可笑禁忌，还意味着日本人不得唠叨和探究此类矛盾：一面是民主自由的高谈阔论，另一面则是痛苦的忍饥挨饿。下面这首原定发表于《改造》1948年2月号上的诗，由审阅官英译后旋即遭到查禁：

每当时间到了
“饭做好了，爷爷
饭做好了，奶奶”我们说
变味的饭菜端到了他们的前面
只有那么一点“定量配给”
一旦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他们被告知闭上嘴只管吃
这样一来
他们的生存正如国家的生存
国家在享受自由的盛宴
好像它在试试看
不管怎么说到底能撑多久
这就是“定量配给”
一天清晨
吃饭还太早
庭院里的桃花开了
爷爷奶奶进了院子
他们伸展着弯曲的腰背
向天上打着哈欠³²

421

这并不能算是不朽的文学作品。但在战败两年半之后，作家竟仍被禁止表达如此观点的事实，正如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所言，的确对占领时

代“封闭的言说空间”揭示良多。那些对昨日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迅速变身为今日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者提出讽刺疑问看法的人，不时（绝非总是）感觉到审阅官设下的圈套；那些指摘政治在占领下被阉割的人往往被迫保持沉默。投降3年后，日本著名报人马场恒吾，仍然无法发表如下内容的评论文章：战后内阁平庸，因为历任首相不得不唯唯诺诺。³³

这种软性独裁的一个微小受害者，是尖锐的政治漫画。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群干练的社会和政治漫画家，以深受西方影响、颇有才气的插图画家北沢乐天为首。北沢一伙常在题为《パック》（Puck，意为恶作剧的小精灵）的幽默杂志上发表漫画，对日本文化的弱点、社会的不公与政治的腐败和弊端进行尖锐的讽刺。1930年代以来，对世相的辛辣讽刺遭到禁止，新世代的漫画家纷纷登场。为首的近藤日出造富于才华、风格多变，在政治潮流中乘机而起，却从未停止特立独行地贯彻自己的目标。在近藤的领导下，漫画家们起初宣布政治中立，声称不过是受到“一种健全的虚无主义”的激发。他们夸耀只制作“无意义的漫画”，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了日本对外战争热切的宣传者。³⁴

与电影工业（映画产业）的情形相同，漫画家们事实上安然无恙地逃脱了投降后的清洗，并且宣称自己一贯是民主的倡导者。作为这种迅速转变的表征，战时宣传的主要媒介——《漫画》月刊于1946年1月复刊。封面是近藤日出造的漫画，描绘倒霉的东条英机被关在监狱的铁栅栏后面。近藤他们还在《民报》等新的左翼出版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然而，这些漫画家很快明白了民主是有界限的。近藤为《漫画》战后的创刊号描绘的穿和服的女子与大块头美国兵跳舞的漫画，被不准付印。两个月后的3月号，审阅官又禁止了另一位有名的漫画家杉浦幸雄的作品发表。在杉浦的漫画中，一位做美国兵生意的、抽烟的妓女，站在一位无家可归者的旁边。相比之下妓女更走运的原因一目了然：她身穿和服，披着一件有星条旗标志的羽织。“找份工作”，妓女教训那位流浪者。在她身后的墙上贴着左翼的标语：“打倒天皇制”。

杉浦的谐谑犯了民间审阅部的三重禁忌：攻击天皇、凸现了经济危机并且唤起对美国兵与日本女性“亲善”的注意。胜利者们也不能容忍

另一本杂志上的巧妙漫画，嘲讽日益迫近的战犯审判将天皇排除在外：画面上，一位大个儿军警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都逮进了监牢，漫画有一行冷嘲热讽的说明文字：“只留下了天皇，其他人都进去了”。³⁵

天皇并非正式禁止讽刺的对象。实际上有些杂志，尤其是左翼月刊《真相》，的确敢于将他作为漫画的题目。³⁶ 然而，1947年之后，即使是对天皇温和的讽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关于讽刺权威的更为重大的官方限制，涉及实际统治这个国家的外国人。麦克阿瑟将军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降临人间之前的裕仁天皇。一位担任 CCD 审阅官的欧洲人，私下将 SPCD 部门解释为“道格拉斯批判防止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ticism of Douglas）的缩略语以自娱。³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麾下的占领军，从最高级的将校到最下级的士兵或文员，实际上同样与赞辞之外的批评绝缘。原则上，占领军将校也不接受媒体采访。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方针，主要通过记者招待会和散发文件来传达，要求媒体对此进行顺从的报道。这种权威式的“导向新闻”，被外国记者们认为是开创了危险的先例。³⁸

嘲讽麦克阿瑟统治下日本的民主前景或其本质，是一项冒险的企图。当 1947 年 10 月号的几幅漫画遭命令删除时，幽默杂志《VAN》学到了这样的教训。其中一幅漫画，小麦克阿瑟面对着一只庞大而友善的龙，龙身上写着“日本”，龙的脖子上拴着缰绳，背鞍上写着“民主”。⁴²³ 麦克阿瑟低声咕哝道，“唔，不知怎地我已经驯服它了”。对当时任何的美国报刊而言，这无疑是对占领军面临的棘手挑战以及麦克阿瑟仍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平常写照。然而，民间审阅部的审查官们，将此漫画解释为对麦克阿瑟的批评，通过描绘他无法骑上龙鞍，从而“在日本民主化的过程中度日艰难”。³⁹

这并非表示，占领时期没有机智有趣的漫画。战后最伟大的连环漫画，长谷川町子的《サザエさん》（《阿螺》），于 1946 年初次登场。连环漫画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机智、动人地描绘了一位具有超凡勇气的女性阿螺，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姐妹，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あんみつ姫》（《豆馅公主》）中，年轻女孩们见识了一位中世的活泼开朗的漫画公主，她傻乎乎的名字说明她非常喜欢吃甜豆馅。日本最有创造力、最受崇拜的漫画家手塚治虫，于 1946 年在战后初次亮

相，超越日本的现实局限，创造出一个人形机器人和类人生物的想象世界，对科学、人性、个人的身份以及善与恶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⁴⁰

正如这些例证所揭示，最好的漫画往往在政治领域之外才能发现。报纸漫画家，比如在《朝日新闻》连载作品的清水崑等人，的确由于他们对政治家（如吉田茂首相）滑稽言行出神入化的描摹戏仿而声名大著。尽管如此，据清水崑自己所言，即便是他和像他这样的漫画家，创作的也不是真正的政治漫画，而仅仅是“政界漫画”⁴¹。鲜有例外，他们没有特定的政治观念，没有对滥用权力和权威的尖锐批判，也没有世界性的视野。占领当局的手法，使这样的批判视野的公开发展几乎没有可能。假使我们仅依据漫画留下的视觉记录来判断的话，占领期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任何占领者在场的占领。

对占领政策的根本性批判遭到禁止，基于同理，此禁令亦适用于对同盟国的全面批判，因为说胜利者的坏话，会贬损他们的道德权威。这意味着，日本人所消费的外部世界也必须被净化。有关评论胜利的同盟国及其世界会被视为违反新闻出版法的问题，左翼月刊《改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个案。根据古川纯教授对《改造》月刊的研究，《改造》曾被要求删除以下内容：提及西方同盟国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言及日本军队向中国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军队投降；对美国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影射；将苏联描述为“社会主义的”，将美国和英国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将中国描述为“半殖民地的”；提及“民主的”苏联和“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表达对日本可能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担忧；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譬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羽仁五郎等人的批判）。

《改造》的违规事例还不止于此。1946年中，《改造》还被要求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关于朝鲜的文章的译文中，删除如下字句：“某位美军高官私下向我透露，‘现在朝鲜是新的美国前线的一部分’，而这反映了统帅部大多数人的思考。”审阅官的理由为“所言不实”。在占领当局新的历史逻辑下，“对同盟国的全面批判”，甚至追溯到了中世和近世。1947年8月，《改造》上一篇题为《但丁与哥伦布》的随笔，被命令删去相关段落。这篇随笔述称，在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发展中，有一种获取新的土地作为殖民

地的支配性倾向。1948年10月,《改造》正式被列入民间审阅部关注名单上的“极左”刊物,当时《改造》被禁止提及日本计划仿照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设立“反日活动”调查委员会。尽管这一委员会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是当时的确是在酝酿之中。⁴²

其他刊物也遭到类似的严格审查。世纪之交著名的基督徒内村鉴三,其自传体作品于身后再版时,亦遭到了审查处分。所谓冒犯性的内容,不过是提到了他早期在美国时,纽约的凶杀案和酗酒者比东京的多。对此CCD的审阅官回答,尽管这可能是实情,但是让日本人知道这一点现在太早了。⁴³甚至连顺道提及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牌技不佳这类的琐事,也被命令删除。一位被扣留在威斯康星州麦考伊兵营(Camp McCoy)的前日本战俘的自传体记录,通过了审阅官的详细审查,仅删除了如下字句:“美国人给人的印象颇有 425 教养,但是却惊人地无知。他们真的相信从报上读到的新闻。即便日本人这么容易被愚弄,我们当中也没人相信现在的新闻了。”一本日英辞典的编纂者,未能将如下例句,偷偷添加到动词*denounce*(谴责)名下:“今天美帝国主义比任何帝国主义更应受到谴责。”⁴⁴

这些异常绵密而神经质的审查,延伸到了偶尔提及的对之前战争中美国的同盟国的批评。禁止“对中国的批判”包括:涉及中国国共内战中对日本投降军队的利用,言及对日本残留人员的虐待,以及将中国描述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谈论国共内战本身并非禁忌,但是生动细致地描绘中国的动乱局面,则有可能被视为超越了适当的界限。⁴⁵

有段时间,这样的压制连对苏联的否定性评论也包括在内。1946年1月,哲学家田边元因表达对占领军中苏联角色的忧虑而遭到审查。1946年4月,国会元老尾崎行雄在《创造》发文,因顺便提及苏联国内的压制,也遭禁止。关于雷恩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光明之子,黑暗之子》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11月号的《思想的科学》,因为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遭到大幅删节。甚至到了1948年9月,冷战的紧张氛围在被占领的日本已然确凿无疑,《世界》月刊上的这段文字还因“批判苏联”而遭到删除:“苏联以绝对的独裁的政

策统治自己的国家，因而它以同样高压的独裁态度对待其他小国。”⁴⁶

这种不容许同盟国有任何污点的神秘氛围，促进了非现实的、有时几乎是超现实的公共世界的形成。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战败的日本人被假定无视战胜国同盟的崩溃、中国的国内分裂、亚洲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复活、冷战紧张的决定性的出现，以及核军备竞赛的开始。可以说，他们被置于了扭曲的时间经度之内，尽管往昔的战胜国已经开始新的斗争与论战，在这里胜利方的二战宣传仍然被一再重申。

在此世界中，日本人不能表达对战胜国之间“有关原子能的竞赛从
426 确立世界和平的立场来看，并不是值得欢迎的现象”的顾虑（1946年5月以“对同盟国的全面批判”为由被查禁）；在此世界中，不允许警告“今日之朝鲜成了美国 and 苏联之间的连接点，与美苏两国的国际命运关系深重”（1947年1月被查禁）；在此世界中，尽管西方久已采信铁幕之说，但是日本作者仍然被禁止报道“美苏之间的意见冲突现在广为人知”，或者表达希望这不会导致未来的公开对抗（1947年12月以“扰乱公共治安”为由被查禁）。⁴⁷

电影管制

在6年半的占领期，日本电影摄影所制作了大约1000部长片。直到1949年，每部电影剧本都得事先向最高统帅部的“顾问们”提交两份英语文本。在数不清的场合，在剧本使美国人满意之前，会有大量的意见交换和妥协发生。有些电影导演，譬如黑泽明，无视这些限制的存在而创作活跃；而其他导演，如龟井文夫，则在战后始终未能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⁴⁸

对于黑泽明而言，总司令部的控制，与战时审阅官的压制比较起来微不足道。他将那些战时的审阅官视为天皇崇拜与性幻想压抑所导致的变态白痴。黑泽明在战时执导了自己的首部影片，而他所有的4部战时影片——《姿三四郎》及其续编，《一番美しく》（《最美》）以及未完成作品《虎の尾を踏む男达》（《踏虎尾之男》），均被列入1945年11月盟军统帅部命令销毁的236部“封建的与军国主义的”电影。⁴⁹这并未阻止黑泽明迅速成为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电影革新者。1946年到1952年占领期间，他制作了8部影片。开篇是纯真的理想主义的“民主电影”

《わが青春に悔いなし》（《我对青春无悔》，1946），第二部则是在废墟中逆境生存与委婉纾徐的浪漫故事《素晴らしき日曜日》（《美好的星期天》，1947）。

随着占领的推进，黑泽明继续演绎时代的主题，但是一种更为阴郁的视角，取代了他早期电影中的希望与理想主义。他的电影的主人公也由《我对青春无悔》和《最美》中的女性，转为了男性角色——通常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个人，不时被过去所诅咒，而且几乎总是身陷拜金主义的、奸险的社会困境。在一部又一部影片中，这位男主人公总是一成不变地由三船敏郎所扮演，穿越于日趋阴暗的境遇之中：黑社会（《酔いどれ天使》，1948），复员兵的犯罪者（《野良犬》，1948），贪赃枉法的新闻记者（《丑闻》，1950）以及绝望的、错乱的无辜者（《白痴》，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1951）。即便他1950年上映的杰作《罗生门》，虽然故事的发生背景是在中世，却通过描摹性、犯罪、暧昧的双关性以及人们讲故事的相对性，成为同时代场景的镜像写照。⁵⁰

龟井文夫的体验与黑泽明形成对照。当黑泽明对总司令部的监督一笑置之，并在容许的范围内驰骋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之时，更为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龟井文夫，则生动地体现了新的审阅民主的禁区地带。这一点显而易见：1946年，龟井发现无法上映一部题为《日本的悲剧》的记录短片。此后又被迫对他与山本萨夫共同执导的野心勃勃的长片《战争与和平》做大幅删节。

《日本的悲剧》主要利用战时拍摄的电影胶片，呈现对导致日本陷入侵略和灾难性战争的日本统治势力的痛彻分析。龟井简洁利落的蒙太奇风格，来自对日本政府宣传片娴熟的剪辑技巧，也与战时美军宣传影片的首席执导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剪辑手法相似。这的确有些讽刺。卡普拉剪辑艺术的代表作，是反日影片《了解你的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my—Japan*），比龟井的《日本的悲剧》早近一年上映。尽管《日本的悲剧》相当忠实于日本共产党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即所谓的讲座派路线）分析，强调封建的因袭与天皇制下统治者集团的军国主义及其镇压，但是它与卡普拉的战时宣传影片并无根本的不同。

迄今为止，龟井的纪录片中最令人难忘的镜头（此处卡普拉肯定会为之喝彩），是一组叠映画面：在观众眼前，裕仁天皇从严肃的、身着

戎装的国家司令官，变身为仁慈和蔼、略带佝偻，穿着朴素的外套、系领带戴呢帽的文民形象。主要的电影公司东宝、松竹与日活映画，都拒绝这部纪录片在他们的电影馆上映，显而易见更多的是由于财政问题，
428 而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龟井后来回忆说，起初上映时有些观众起哄，有一位还将木屐扔向银幕。这是部非主流影片，但是吸引了一些好奇心强的观众——大约日均 2500 人次观影。1946 年 8 月中旬，影片突然被总司令部禁映。

龟井是位左翼电影人，但不是共产主义者。1920 年代末，他在苏联学习过纪录片的制作技法。他遭受过帝国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先后禁映的独特经历。1939 年，他拍摄的在中国战争的阴郁记录《战斗的士兵》（《战斗的士兵》），曾经得到军部的正式援助，但是旋即因影片的“失败主义”遭撤回赞助。此片被内部人士戏称为《疲れた兵队》（《疲惫的士兵》）。与此略有相似，在筹拍纪录片《日本的悲剧》时，龟井得到了民间情报教育局的美国官员的强力支持，直到放映约 3 周后，威洛比少将亲自干预并且命令没收所有的拷贝和底片。⁵¹

威洛比是应吉田茂首相的请求介入的。吉田认为龟井的影片对天皇的处理是大不敬，并成功说服威洛比的两位助手与他同观这部冒渎天皇的作品。处在自身的立场，威洛比阵营更烦恼的是，影片对占领当局开脱裕仁战争责任的政策暗含批判。正如龟井以及其他人后来的评述，对这部纪录片的禁映，实质上标志着有关天皇战争责任的严肃讨论消失的时刻。查禁这部纪录片的公开理由，正如与吉田茂同观影片的一位美国人所言，“这样极端地对待天皇，将诱发暴动和骚乱”。⁵²

《日本的悲剧》的禁映，至少向那些努力揣测最高统帅部的“民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人传达出三项教训。第一，它不仅揭示出绝对权力的固执己见，还有其专横性。毕竟，总司令部审查的作品，纯粹是对投降前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滥用权力的日本人自身的批判，正是占领当局声称希望推进的自由与批评之议论的典型。龟井及其同仁受民间情报教育局官员的鼓励承担此片的拍摄，而且忠实地履行了审查手续并获得了官方的上映许可。当被告知影片将被查禁之时，制片人岩崎昶真如五雷轰顶。而威洛比本人私下也承认，这部纪录片并没有真正违反审阅方针。

429 龟井本人漠然的反应则是，自从 7 年前在帝国陆军那里遇到麻烦以来，

他自己没有什么变化，显然社会情势也没有多少改观。⁵³

传媒界人士谨慎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严肃认真的批判，可能会导致付出过分沉重的代价。尽管主要是利用现成的电影胶片，但是制作《日本的悲剧》对日映公司来说仍然所费不赀。影片的禁映使日映公司濒于破产，并且严重警告了其他任何企图抗争的人。对印刷业人士而言，延迟发行与直接的禁止出版都会导致财务困难，他们同样敏锐地调整了自己说真话的会计成本。⁵⁴

从这一影片的突然禁映得到的第三个教训，则关乎意识形态：审阅制度的审查目标在改变，正缓慢然而不可动摇地从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目标转向左翼的目标。如果说这种关注焦点的变化在1946年还不易认清的话，那么到了龟井文夫与山本萨夫完成他们雄心万丈的长片《战争与和平》时，已经颇为明了。

民间审阅部的下级审阅官们展示了他们的博学多识，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剧本上做了批注，大意是：这部电影的题目，“显然是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尽管这题目是来自托尔斯泰，但是故事情节——一位早已被认定死亡的士兵在战后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嫁给了他的好友，实际上是来源于戴·沃·格里菲思（D. W. Griffith）1911年革新性的电影《伊诺克·阿登》（*Enoch Arden*）。⁵⁵ 像《日本的悲剧》一样，1947年的《战争与和平》，起初也受到官方的鼓励。这一次是由日本政府奖励、总司令部主张，以纪念新宪法的理想。主要的电影公司，皆被敦促制作电影以体现新的国家宪章的理念。东宝映画选定龟井和山本执导一部故事片，以传达宪法第九条的反战理念。在民间情报教育局指导下完成制作后，影片于5月中旬提交民间审阅部，立即受到传播“共产主义宣传路线”的严厉批判。6月中旬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将此描述为“赞赏示威运动，将天皇与不名誉的集团等同视之，过度暴露投降后日本的饥饿和道德的堕落”。此备忘录接着记录道，这部影片陷入了与《日本的悲剧》同样“需要敏感关注的”类型。

其他几份备忘录，更具体地说明了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路线”。例如，劳动者罢工和示威的场面，被以“煽动社会不安和批判最高统帅部”的理由删去。正如审阅官所言：“示威者举着‘言论自由’、‘让我们劳动者有饭吃’等横幅标语，以及群众欢呼并加入游行队伍等等，使

人联想到批判最高统帅部的审阅制度和鼓动劳工斗争。”一段涉及凶暴的破坏罢工者的情节被彻底删除，理由是容易将右翼的破坏罢工者与支持天皇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联系起来（实际上，这样的联想也并非不合情理）。据称，这些镜头还通过展示一位主角被破坏罢工者痛打的场面，以“暗示美国人的‘强盗’逻辑”，“巧妙地蕴含着对美国的批判”。

审阅官们还在下面的镜头中，察觉出对战胜国的批判和对道德颓废的“共产主义的”强调：一个男人背对镜头与街边妓女讨价还价的一闪而过的镜头；酒吧间场景中，墙上装饰着好莱坞女明星的海报和白人的裸体照。尽管民间情报教育局官员向日本人打包票，银幕上的接吻镜头是开放和民主的表现，但是此处混乱的接吻、热舞及其他的夜生活场景，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批判，暗示了这些公开场合的情爱表现是由于美国的影响”。

尽管使审阅官恼怒的许多场景，涉及占领下社会和政治状况的真实描绘，然而《战争与和平》自始至终，仍然是部令人心酸落泪的反战情节剧：被宣布阵亡多年后从中国归来的主人公，发现妻子嫁给了自己过去最好的朋友。他的好友受到在中国的战争经历刺激而精神失常，成了主人公的儿子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在悲惨的生活条件下，妻子通过做计件的零活支持这个重新拼凑起来的家庭。影片的许多场景使观众难以释怀：战斗的恐怖、中国人的苦难与宽容、东京的空袭、战后脏乱的生活环境、顽强的流浪儿和年轻的卖春妇、旧军官的腐败、生活在边缘者享乐主义的逃避。谁该为这所有的不幸和堕落负责？

影片的答案使审阅官们惊惶失措：责任在于那些利用以天皇为中心的社会教化为战争服务的“贪欲者”。受到战争刺激的复员兵，发现自身的困境而陷入疯狂，呼喊“天皇万岁”、想象自己重新回到战场上的场景，被审阅官当作“批判最高统帅部”，理由竟然是“最高统帅部承认了天皇制，而这一场景是通过暗示只有发疯的复员兵才想到他们的天皇，来试图轻视天皇制”。这一镜头最终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那句让人不舒服的话被删除了。

最终，民间审阅部撤回了当初审阅官的多项批判，但是要求从5月份民间情报教育局批准的样片中剪掉17处镜头，共计达30分钟。即便经过这些删削，《战争与和平》仍然是投降后描绘日本的电影中最有勇

气的作品之一，是传达出那个时代的苦恼、破败、紧张、希望和热情的内心深处感觉的稀有之作。尽管有审阅官的干涉，这部电影主要由理想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推动的左翼视野，仍然十分清晰。影片对受日本侵害的中国人的同情描绘，在当时的日本殊为罕见。此片的3位主人公，他们被战争荒诞扭曲的命运，最终成为简直难以置信的最高层次的宽恕与爱的体现。在孩子们玩耍的校园背景下，影片的结束语既凝练朴素又意味深长，唤起了教育新一代珍视和平与民主的梦想。尽管如此，观众仍然愿意观看这部电影。评论家赞扬《战争与和平》是当年最好的影片之一，而且有大量观众蜂拥而来。然而，龟井将没有机会再重复这样的辉煌，因为此后他发现，找到导演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尽管《战争与和平》如此野心勃勃，相比许多镜头在剪辑室里被迫剪掉更令人遗憾的是，影片最终未能真正传达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原因很简单，影片中没有美国人，没有占领，看不见外国权威的存在。这是迫不得已的。尤其在占领初期，电影制作者和其他摄影者、视觉艺术家，被命令要避开美国人的存在。禁令也有例外，但是仅限于反映征服者仁慈和蔼形象的场合。占领期结束后，导演山本嘉次郎曾经回想起，当初在东京拍电影是多么困难。导演不得拍摄美军大兵、吉普车、英语标识以及被占领军接收的建筑物，更别提拍摄被烧毁的地区了。就连山本的一部电影剧本中口头提到了“被烧毁”，台词竟然也被删除。他的另一部电影中有飞机的声音，也被命令销掉了。既然当时没有日本飞机飞行，这种音响效果代表的只能是美国军用飞机的声音，这同样被解释为对占领当局的批判。⁵⁶

“被占领的”银幕不仅呈现出一个新的想象的世界。它也让真实的事物消失无踪。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正式说来，最高统帅部的审阅制度从1947年开始趋缓，并于1949年10月民间审阅部解散时终止。1947年中期，传统戏剧的事先审查被解除，5月份首先是文乐木偶戏、6月是歌舞伎紧随其后，9月份则是能乐。11月古典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赤穗四十七义士），以全明星阵容重返舞台。（此前唯恐这些封建忠义与复仇的故事，可能引发对

新到来的占领军的猛烈报复。) 1947 年 8 月后, 多数广播稿无须再经事先的批准, 3 个月后, 唱片也无须再在发卖前接受审查。10 月, 除了 14 家出版社之外, 其他所有出版社由事前审查变更为事后审查, 而到了 1948 年 9 月, 剩下的出版社也从毛条校样 (版面内允许检查和改正错误之前在活版盘内所选出的校样) 阶段就得接受检查中解脱出来。到 1947 年 12 月, 除了 28 家杂志以外, 其他所有杂志都被变更为事后检查的对象, 剩下的 28 家杂志继续接受发行前检查, 直到 1949 年 10 月。到 1948 年 7 月底, 所有主要报纸和通讯社, 都解除了发行前的检查。

然而, 这种正式控制的缓和容易令人误解, 因为审查制度在 1947 年后采取了新的形式, 而且直到 1949 年都未终结。民间审阅部无限蔓延的官僚机构, 实际上于 1948 年才在人数上达到巅峰, 恰好是在美国国务院抱怨审阅活动造成了“延续日本独裁主义传统的影响”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官员离开了总司令部, 并且由更为保守的技术官僚接替, 审阅制度变得更为严格、专断和不可预料。尤其是在出版业, 检查制度更加隐蔽而阴险, 由事先审查改变为事后审查, 对许多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来说, 更给人以恐怖感而非解脱感。因为一旦占领当局发现他们的出版物不合要求而下令召回报纸、杂志或者书籍, 就更会使他们遭到惨痛的经济打击。在经济不安定的状况下, 审查的暧昧和肆意, 对达成最高统帅部的目的尤为适宜, 因为少有出版者敢冒出版物上市之后被查禁的风险。结果是, 随着占领进程的发展, 谨小慎微和自我审查的倾向愈加明显。⁵⁷

这种威吓战术还有其他的形式。当执行事前审查制度时, 总司令部的高官有时只是“扣留”或者故意忘记技术上并不违反出版法规但是仍然不合要求的文章放在了哪里, 以此造成文章错过发稿日期。这样的情形多次发生在日共机关报《红旗》呈交给民间审阅部的有争议的文章上。据说这是 CI&E (民间情报教育局) 的权势人物——情报处长唐·布朗 (Don Brown) 的拿手好戏, 民间审阅部常将有争议的材料提交给他处置。总司令部官员还可以通过操纵占领时期一贯短缺的纸张配给, 对出版社非正式地实行赏罚。左右出版市场的另一阴险形式, 则是 GHQ 掌控外国书籍的翻译特许权, 译书必须获得民间情报教育局情报处的认可。⁵⁸

还有一种更为强硬的手段。GHQ 官员有权要求触怒他们的作家和编辑立即解职。最高统帅部（SCAP）初期的清洗指令（1945 年 12 月），只包括少量的媒体高层人士，而正式全面清除珍珠港袭击之前与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宣传相关的有影响的媒体人员，直到 1947 年末才开始。当 1948 年 5 月一再拖延的媒体大清洗终于结束之时，约有 2295 人被审查，1066 人被清除（其中 857 人早已辞职或引退）。⁵⁹

与“昔日战争”相关的清除行动几乎尚未停止，GHQ 官员就开始非正式地要求管理层开除他们由于冷战原因而不能容忍的记者和编辑。例如，1948 年 10 月，《日本评论》的发行人铃木利贞被民间情报教育局的丹尼尔·伊伯顿（Daniel Imboden）少校吩咐开除他的副主编，罪名包括：企图发表加拿大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诺曼（E. H. Norman）有关言论自由以及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伊藤律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铃木被告知，如果他不这么做，他自己就可能遭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且将被送往冲绳服刑。副主编于当月辞职。此后不久，在所谓的 12 月事件中，《改造》的 4 位编辑被迫在类似的情形下辞职，他们甚至招致一位 GHQ 日裔官员的到访，向他们提出到冲绳“做苦工”的相同威胁。⁴³⁴这种露骨的威胁，因为审阅活动的另一侧面而颇具分量：冲绳，在美国人将这个战略地位重要的岛屿打造成主要的冷战军事基地的过程中，一直被秘密遮蔽于美国的严酷统治之下。贯穿整个占领期，实际上直到 1955 年，没有关于冲绳的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在媒体发表，将这个实际上看不见的省份，想象成一处发配服刑的殖民地，似乎完全合乎情理。⁶⁰

威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并且判处劳役，这是一个有些极端但是并非全然无谓的惩戒。滥用审阅权力更为极端的事例，发生于 1948 年 9 月，当时这出极其荒诞的事件涉及一家娱乐报纸。事件的起因是 1948 年 5 月 27 日的《日刊スポーツ》（《日刊体育》）发表了一篇题为《汤普森先生介绍大都剧场美国裸体舞表演》的文章。GHQ 主管娱乐表演的一位官员在观看了浅草欢乐街的脱衣舞后，向日本记者评论说，那里的脱衣舞娘并不怎么吸引人，他乐于介绍他们看一场真正的美国脱衣舞滑稽表演。

尽管此报道属实，而且通过了民间审阅部的审查，但是被事后追认为攻击 SCAP 的权威，并且开始遭到正式的追诉。9 月 1 日，美国军事

法庭宣判，主编服劳役1年，《日刊体育》发行暂停6个月，并处高额罚金75000日元，正式的判决理由为违反出版法规第二条（扰乱公安）。经上诉，主编的判刑和报纸的停刊被推翻，但是不合理的罚金依旧执行。一年后，经过貌似稍为严肃的诉讼程序，3位共产主义者编辑以发表煽动宣传的罪名，遭到审讯并被判处服劳役。⁶¹

乍看之下，汤普森事件本身可能就像是一出滑稽表演。然而，在试探言论表达限度的新闻界人士看来，将这样的事件诠释为GHQ有意图的、有组织的专横跋扈更合乎情理。毕竟，这桩历经数月、令人愤慨的脱衣舞案的性质，远远超出了GHQ某些下属的个人癖好或者偶尔过分的举止，而是戏剧性地揭示了：哪怕是细微或者无心地越出了最高军事权力认为适当的界限，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日本评论》和《改造》的案例，则在意识形态上十分清晰：它们表明，审阅制度现在的主要审查目标是左翼而非右翼思想。这在媒体圈中已非秘密。事实上，在从起初的事先审查程序转为事后审查的过程中，清楚地将左翼视为民主的新的敌人。1947年12月，这实际成了公开的方针，当时在28份留待事先审查的期刊中，只有两份是“极右”刊物（大约总共拥有4000名读者）。剩余的26份杂志，全部是进步和左翼的出版物，发行量共计超出60万份。其中，有些杂志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刊物，包括《中央公论》（发行量80000份）和《改造》（发行量50000份），二者在战争年代都曾经受到帝国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每日新闻社发行的周刊《世界の動き》（《世界动向》）（发行量50000份）与另一份刊物《世界经济评论》（发行量50000份），被审阅官描述为“将精力放在挑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上”，并且预言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世界》（发行量30000份）则被认为在国内问题上温和节制，但是在对美国、英国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通常采取共产主义路线”。

这26份杂志代表的，仅是当时存在的进步和左翼出版物的一小部分。而民间审阅部策略的本质，是要通过刁难和审查这些最有影响、最有声望的传播者，杀鸡儆猴地削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譬如，审阅官曾在秘密文件中阐明，他们为何决定将《潮流》月刊（发行量30000份）留在事前审查的名单上。他们认为，《潮流》，

“被评价为最重要的左翼出版物。执笔者多为左翼学者，他们对于世界的工业、农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头头是道，但是结论的反资本主义和破坏性却一成不变。他们大多数的论述，在狂热的共产主义评论家中罕见地平实，却以如此博学多识和彻底详尽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宣传目的十分见效”。⁶² 对于其他目标刊物的一些经常享有盛誉的执笔者，也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论述，远远超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简单重复。岩波书店出版《世界》的编辑们发现，通常审阅官倾向于以比其他出版社更为严格的反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要求他们，理由是他们应当受到约束，以免被政治左派借势。⁶³

民间审阅部（CCD）出版·演艺·播送处处长罗伯特·斯伯尔丁 436（Robert Spaulding）后来承认，实际上在1945年10月4日《人权指令》颁布之时，审阅官就开始既注意右翼也注意左翼对SCAP和美国的“反民主”批判。由民间情报教育局协办的最早的一档广播节目，拥有《爱国者にきく》（《爱国者宣言》）与《出狱者の时间》的双重标题，设计构思是给新近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机会，表达他们对罪恶的过去和新日本前景的见解。然而12月节目被停播，因为事情变得显而易见，大多数政治犯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46年底之前，民间审阅部开始准备对日本媒体的苏联影响和左翼、共产主义倾向，彻底进行国内调查，尽管直到1947年中期，“左翼宣传”才作为明确类别出现在民间审阅部的秘密清单上。⁶⁴

的确有数量巨大的左翼分析文章通过了审查之网，有些深刻尖锐，有些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教条套语。另一方面，即便是名士派的“温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劳资关系专家，如有沢广巳、大内兵卫、大河内一男等人，虽然被许可拥有大规模的读者，但是都不时受到小的审查刁难。⁶⁵ 如平野义太郎、信夫清三郎等杰出的历史学家，在1947年中期面临更为彻底的压制。在东京大学赞助丛书的第一卷《日本民众革命の课题》中，平野的《日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和信夫的《明治维新中的革命与反革命》被全文删除。⁶⁶

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正式的审查制度逐渐废止，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它正与占领政策保守主义的“逆转”，以及预见中的左翼批判的增强同时发生。1948年4月30日，民间审阅部的核心部门出

版·演艺·播送处，受命对共产主义媒体执行“100%的监督”，主要是出于情报收集的初衷，而非直接管制的目的。1949年初，日本的保守政权经最高统帅部（SCAP）同意，将正式的共产党出版物新闻用纸的配给量，从每月86000磅削减为20000磅。⁶⁷吉田茂政府在GHQ的积极协助下，于1949年末开始实行“赤狩”（赤色清洗），起初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新闻媒体，因为清洗是以“削减”、“合理化”或者诸如此类的委婉表示为借口，针对公共部门的激进员工实施的。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赤狩波及了民间部门以及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横扫出版、电影和公共广播界。

尽管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媒体领域清除“极左”的契机，但是在战争开始数周之前就已经准备停当。6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对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开除公职。翌日，清洗波及日共机关报《赤旗》的17位编辑骨干。日本共产党本身，则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残存下来。为了将清洗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为正当化，麦克阿瑟宣布，共产主义者近期的煽动言论和不法行动，“与过去军国主义领导人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的做法惊人相似，而他们的目的一旦达到，必然将日本引向更加深重的灾难。假使允许这种无法无天的煽动不加遏制地继续下去，即便现在看起来尚处于萌芽状态，也将冒着根本压制日本的民主制度、直接否定同盟国政策方针之目的和意图、丧失日本政治独立的机会、并且毁灭日本民族的风险”。⁶⁸

6月26日，朝鲜战争开始翌日，《赤旗》被命令停刊（起初为停刊30日，但是后来修正为无限期停刊）。3周之内，约有700种共产主义和左翼报纸停刊，到1950年10月，据SCAP的官方数据，这种无限期停刊扩大到1387种出版物，（另据统计约为1700种）。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和贯彻其指令的日本保守政府，通过将共产党领导人与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等同起来，为这些清洗和压制行动正名，但是对许多人而言，历史上更为明显的前车之鉴，则是战前军国主义对左翼反抗压迫的镇压。既然媒体被置于强大的压力之下，以顺应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官方立场，那么倒更像是先前日本帝国强制“一亿一心”的单一口径时的情形。⁶⁹

与左翼刊物停刊并行的，是赤狩在公共部门的扩大化以及向民间部

门的扩展。这些开除行动的首要目的，是削弱左翼在劳工组织中的影响，但是这种政治迫害也改变了从大众媒体上所获见闻的面貌。超过700人被清除出新闻界，其中广播界104人至119人（统计数字各有不同），电影界137人。到9月份时，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被解雇。尽管起初GHQ的停刊处分，针对的是“极左”出版物，它们大多仅有很小的发行量，但是赤狩却打击了主流媒体。例如，对公共放送（广播）局的清洗，于1950年6月28日在各个城市同时执行，包括张贴各放送（广播）局即将开除的职员名单。在一些城市（如大阪），据报告依照麦克阿瑟的指令，美国军警参与了对指定人员的排除行动。⁷⁰ 438

对主流新闻的第一波赤狩，于同日展开。当涉及民间部门时，解雇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在朝日新闻社，指定的开除人员被依次召唤到一位面色苍白、明显颤抖着的高层经理的办公室里。在读卖新闻，自1946年以来，经营者与职员之间始终激烈对立，是由一位身旁护卫着便衣警察和公司警卫的干部宣读解雇决定，并且声称是依照麦克阿瑟6月6日的信函行事。在共同通讯社，在宣布被解雇之后企图滞留的职员，被管理层召来的武装警察架出。在电影产业界，排除行动于9月份实施，是在GHQ劳动处高官召集各制片公司的高层，命令他们从公司中排除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必须自担责任之后。⁷¹

尽管GHQ从未诉诸日本帝国政府《治安维持法》的手段，对左翼表现进行有组织的镇压，但是它停止活动的处分、不断侵扰和政治迫害的手法，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许多进步和左翼的出版物停刊，其他刊物的编辑方针也趋于保守。⁷²然而在此之上，不少真正理想主义的民主支持者幡然省悟，由早期热心支持美国转变为怀疑派或者彻底的反美派。清洗运动还证明了教条的左翼对资产阶级伪善原本自以为是的非难的正确性。

与占领期的巨大发展和成就相对照，SCAP审阅民主的统治真的那么问题严重么？答案是肯定的。自然，从数量上讲，被审查删改的案例数量与印刷出版业繁荣的洪流相比极其微小。不可否认，媒体在占领期终结时比战争时期要大为活跃。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占领期的延续，他们变得逐渐丧失多样性和活力。当然，对于那些深受战时压制之苦而惊 439

喜于投降后初期改革活力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而言，目击美国人乐于行使绝对权力的姿态是令人沮丧的，而眼熟地发现他们很快展示出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敌意，则更加令人灰心。

岩崎昶，曾经参与拍摄被美国人没收的有关广岛和长崎“原爆”破坏的纪录片，后来又成为龟井文夫命运多舛的《日本的悲剧》一片的制片人，他狡黠地将占领当局呼为“军阀”。岩崎昶回忆起当他发现无法反抗《日本的悲剧》遭禁映时的感受，“我厌恶地意识到，非民主的美国军阀现在将日本抓得是多么紧”。左藤忠男，这位尖锐辛辣、自学成才的战后电影的资深批评家，回想占领期是由“鼓励的民主”时代与随后“压迫的民主”时代两个阶段构成。对松浦总三而言，作为《改造》的编辑者，他亲眼目睹了GHQ日益狂暴的反左翼运动，直到1952年占领当局实际从日本撤离，“民主的新闻界的复兴”才有了转机。事实上，当时出现了堪与占领初期匹敌的开放的、春天般的氛围。”直到那时，坦率地讨论占领本身等问题才成为可能。

这种审阅的民主更深层的遗产，超越意识形态保存了下来。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以“自由表达”为名实行的秘密审阅和思想统治，无损于战后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一方面高高地挥舞着“自由表达”的旗帜，一方面却严厉地限制对麦克阿瑟将军、SCAP当局、庞大的占领军全体、全部的占领政策、美国和其他战胜的同盟国、战犯审判的诉讼和判决，以及胜利者出于实利的考虑否认天皇个人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的任何批判。审阅的民主，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清除民主威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并且强求舆论一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而已。

依照这一观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遗产，使得认同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强化了与政治的、社会的权力相关的集体宿命论，以及一种普通人的确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意识。尽管不断地谈论民主，征服者却致力于控制舆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们让人明白了沉默地顺应大势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征服者如此成功地巩固了这种意识，以至于在他们离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之外的许多人，包括美国人，开始将这种意识当成是日本人原本独有的态度。

注释:

- 1 引自平野共余子对前 SCAP 高官 Seymour Palestin 的访谈, Kyoko Hirano (平野共余子), *Mr. Smith Goes to Tokyo: 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1945 - 1952*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pp. 72 - 73。
- 2 关于“权力者崇拜”事件, 参见 Robert M. Spaulding, “CCD Censorship of Japan’s Daily Press”, 收入 Thomas W. Burkman 编,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Arts and Culture* (Norfolk, Va.: 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 1988), pp. 6 - 7; William J. Coughlin, *Conquered Press: The MacArthur Era in Japanese Journalism* (Palo Alto: Pacific Books, 1952), pp. 51 - 52。
- 3 这份重要指令 (SCAPIN 16) 收入 Coughlin 前引书, p. 147 - 149。
- 4 民间情报教育局对媒体“积极的”管制的个案研究, 参见 Malene Mayo, “The War of Words Continues: American Radio Guidance in Occupied Japan”, Burkman (1988), pp. 45 - 83。
- 5 到 1945 年 12 月, SCAP 的审查官们审阅了 518 部“古典或新古典”戏剧, 禁止其中 322 出戏上演, 绝大多数为歌舞伎剧目。参见 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Theater and Motion Pictures (1945 through December 1951)*, monograph 16 in *History of the Non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1952;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p. 4 - 5。还可参见同一文献系列中的 monograph 15 (*Freedom of the Press*) 和 monograph 33 (*Radio Broadcasting*)。
- 6 CCD 审阅活动的详细年表, 参见古川纯《年表——占领下の出版・演藝・放送検閲》, 《东京经大学会志》118 (1980 年 12 月) 号, pp. 231 - 251。包罗详尽的被审阅出版物的总览, 参见奥泉荣三郎《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解题》(东京: 雄松堂, 1982)。这一指南是对占领结束后, 美国马里兰 (Maryland) 大学东亚图书部收存的大量 CCD 档案的日英双语解说。遗憾的是, 由于这些文献年久易损, 1990 年代以来查阅受到了限制。Burkman (1988) 一书, 收录了有关占领下的文化艺术的论文和讨论, 提供了在不同领域对审阅意义的观点和看法。原始资料研究代表性的英文成果, 是 Marlene Mayo 的著述。除了 Mayo (1988) 一书外, 还有她的论文 “Civil Censorship and Media Control in Early Occupied Japan”, 收入 Robert Wolfe 编, *Americans As Procons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 - 1952*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3 - 320, 498 - 515; 亦参见 Mayo, “Literary Reorientation in Occupied Japan: Incidents of Civil Censorship”, 收入 Ernestine Schlant 与 J. Thomas Rimer 编, *Legacies and Ambiguities: Postwar Fiction and Culture in West Germany and Japan* (Washington, D. C. and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5 - 161。

江藤淳基于对原始文献的研究, 对占领期的审阅制度发表了犀利的评论。参见 Etō Jun “One Aspect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Censorship Operation and Postwar Japanese Literature”, occasional paper of the Wilson Cent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80); “The Civil Censorship in Occupied Japan”, 《比

较文化杂志一》（东京工业大学，1982），pp. 1-21；以及“The Sealed Linguistic Space: The Occupation Censorship and Post-War Japan”，《比较文化杂志二》（1984），pp. 1-42。江藤淳关于审阅制度的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包括前述论文的日文版，收入江藤淳《落叶の掃き寄せ——一九四六年宪法——その拘束》（东京：文艺春秋，1988）。江藤认为审阅制度有害于败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的观点，受到了 Jay Rubin 的质疑。参见 Jay Rubin, “From Wholesomeness to Decadence: The Censorship of Literature under the Allied Occupatio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1.1 (1985), pp. 71-103。亦可参见 Burkman (1988) 一书中 Rubin 的论文, pp. 167-174, 以及 Yoshiko Yokochi Samuel 对审阅制度的良性遗产的更为客观的评述, pp. 175-180。对受审查的许多文学作品的引用实例, 还见于 Samuel “Momotarō Condemned: Literary Censorship in Occupied Japan”, 此论文未发表, 为 1982 年 New England reg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上提交的会议论文。

日本学界关于新闻出版业的审阅制度的先驱性研究, 是松浦总三《占领下の言论弾压・改订版》（东京：现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1969年初版，1977年修订版）。亦参见春原昭彦《占领検閲の意图と実態》，《新闻研究》395、397（1984年6月、8月）号，pp. 80-101, 88-96。Haruhara（春原昭彦），“The Impact of the Occupation on the Japanese Press”，Burkman (1988), pp. 21-31；Jim Hopewell, “Press Censorship: A Case Study”, *Argus* 6.6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y 1971): 19-20, 58-64；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东京：洋泉社，1985），pp. 122-153。PPB 的月度审阅量，见 Spaulding 前引文，p. 5。邮件和电话监控，占 CCD 审查的日文资讯的相当比重，参见 U. S. Army,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MacArthur in Japan: The Occupation, Military Phase*, vol. 1, Supplemen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pp. 238-239。据估计，总共约有 11000 篇杂志文章遭到审查；Mayo (1984), p. 512。

7 有关非日文资讯的审查，参见 Coughlin 前引书，pp. 47-49；关于秘密通告，见前引之《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pp. 33-39；有关秘密告别的方针，参见 Rubin 前引文，p. 85。

8 Spaulding 前引文，pp. 7-8。

9 对著名作家的审阅，参见 Mayo (1991)；Rubin (1985)；Samuel (1982)；木本至《杂志で読む战后史》（东京：新潮选书，1985），pp. 19, 56, 116-118；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p. 21-25, 185。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是《A 夫人的信》。关于托尔斯泰，参见 Hopewell 前引文，p. 63（引用了 1947 年 7 月 13 日 *St. Louis Post Dispatch* 报上发表的前 CI&E 官员 David Conde 的文章）。Hopewell 这篇默默无闻的文章，是最早全面研究 CCD 档案的论文之一，文中大量引用了审阅官的真实报告。中村光夫的说法，引自 Rubin (1985), pp. 75-76。

10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p. 130-131。GHQ 的翻译多有赖于第二代的日裔美国人，对这些日裔而言，日语只是第二语言。日本方面不少涉及与征服者沟通的不正确、不完全的怨言，成了直接针对这些第二代的日裔美国人。这些种族间的紧张，构成了占领时期微妙的、有待考察的亚主题。例如，参见日本放送协会编《续·放送夜话》（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0），p. 17；Akira Iwasaki, “The Occupied Screen”, *Japan Quarterly* 25.3 (July-September 1978): 308, 315；Kiyoko

- Hirano, "The Occupation and Japanese Cinema", Burkman (1988), pp. 146, 148, 以及 Frank S. Baba 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Burkman (1988), p. 164。
- 11 这是松浦总三的基本观点; 参见《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5-6, 17-18, 57-58, 323-324, 349, 354-355, 403。
- 12 日本放送协会编《续·放送夜话》, pp. 13-18。这些批评者也承认, 美国的广播方针有其积极的方面。
- 13 Haruhara (1988), p. 28.
- 14 参照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5-7, 64-73; 朝日ジャーナル编《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67), 第一卷, p. 146。伏字的使用(通常以 XX 或 OO 之类逐字替代被删除的文字), 始于 1925 年左右, 1937 到 1938 年废止。理由是思想警察断定, 让敌国悟到日本国内对战争政策可能有批判或反对意见, 是失策之举。
- 15 出版法规多处均有转载, 可参见 Coughlin 前引书, pp. 149-150。
- 16 见载于古川纯《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 《东京经大学会志》116-117 (1980 年 9 月) 号, pp. 136-137。1946 年 11 月 25 日详细的、附有原评注的审阅日志, 参见 Etō (1980), pp. 17-20; Etō (1982), pp. 5-6。括号内的说明, 为本人所添加, 参照了 11 月的审阅日志和实际的审阅官评注。有关电影的禁止事项 (1945 年 11 月的规定), 参见 Hirano (1992), pp. 44-45, 49, 52-58, 75, 78。
- 17 表格样例, 参见《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 pp. 41-42。
- 18 关于原爆文学与科学数据的审阅, 参见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167-212; 堀场清子《原爆—表現と検閲 日本人はどう対応したか》(东京: 朝日选书, 1995); 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Damage Caused by the Atomic Bomb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编辑, Eisei Ishikawa 与 David Swain 译,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Physical, Medical,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Atomic Bomb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5, 503-513, 564, 585; Glenn D. Hook, "Roots of Nuclearism: Censorship and Reportage of Atomic Damage and Casualtie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3 (January-March 1991): 13-25; Monica Braw, *The Atomic Bomb Suppressed: American Censorship in Occupied Japan*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1), 尤可参见第 8 章; Mayo (1991), pp. 150-152。James Yamazaki 医生是 1949-1951 年被派往长崎研究放射性影响的美国科学家, 尤其是调查原子弹爆炸对胎儿的影响。他实际上在离日前夕才发现, 有人刻意向他隐瞒了美国之前的相关报告书与调查结果; 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这一点, 参见 *Children of the Atomic Bombs: An American Physician's Memoir of Nagasaki, Hiroshima, and the Marshall Island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关“原爆”的电影的审阅, 参见 Hirano (1992), pp. 59-66。1945-1946 年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涉及“原爆”的著作, 见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败戦と占领》(东京: 青木书店, 1990), pp. 237-238。详细的纵览, 参见《中国新闻》1986 年 7 月 30 日到 8 月 12 日间关于占领期“原爆”文学的 30 回连载。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果的目击者堀场清子强调, 作者自我审查, 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局审阅制度的强制规定是分不开的。例

- 如，参见堀场《原爆—表现と検閲》，pp. 32–35, 54, 164–172。亦参见《朝日新闻》1994年5月16日对原CCD审阅官回忆的报道。
- 19 映画制作会社日映藏匿了一份这部被禁影片的拷贝，在占领结束时上映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拒绝公开影片的全部内容。参见岩崎昶《日本现代史大系·映画史》（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pp. 226–227；岩崎是广岛·长崎拍摄影片的联合制片人。1966年此片被美国政府解禁后，根据其中的一些剪辑片断制作了英文记录短片 *Hiroshima-Nagasaki, August 1945*。短片于1970年上映，监制为 Eric Barnouw。参见 Barnouw, “Iwasaki and the Occupied Screen”, *Film History* 2 (1988): 337–357；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p. 192–195。
- 20 丸木夫妇的作品集，收入 John W. Dower 与 John Junkerman 编，*The Hiroshima Murals: The Art of Iri Maruki and Toshi Maruki*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5)。
- 21 “原爆”灾难的照片，最初主要发表于1952年8月6日的《朝日グラフ》。日本政府报道部的摄影师山端庸介，对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惨状进行了全方位拍摄。山端秘密保存了上百张底片。占领结束后不久在日本出版，直到1995年才出版英文版。参见 Rupert Jenkins 编，*Nagasaki Journey: The Photographs of Yosuke Yamahata, August 10, 1945* (San Francisco: Pomegranate Artbooks, 1995)。亦可参见 John W. Dower, “The Bombed: Hiroshimas and Nagasakis in Japanese Memory”，收入 Michael J. Hogan 编，*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116–142。
- 22 Braw, pp. 94–100；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 189。对于将长崎与马尼拉暴行相提并论的事实，Robert Spaulding 注意到，这极易使日本人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行为与他们的罪行彼此抵消。” Mayo (1991)，pp. 151–152。
- 23 吉田满曾数次修改自己的作品。这里引用的是审阅官对日文原文的翻译，引自 Etō (1982)，pp. 9–10。对占领期结束后吉田作品最终版本的上佳译本，参见 Richard Minear 译介的 Yoshida Mitsuru,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江藤淳曾将对吉田文本的审查作为主要的例证，以阐释他所谓的占领期的“封闭的言说空间”；参见 Etō (1984)。另一位写到“大和”号的作者，在企图表达“当许多兄弟捐躯而我们活了下来下来的深重的耻辱感”时，也同样遭禁；Mayo (1991)，p. 149。
- 24 这些字句被从1948年8月号的《改造》上删除；参见古川《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pp. 176–177。
- 25 矢野又吉档案，《败戦のしもと》，见 Prange 文库中有关占领当局审查的文献，现藏于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
- 26 《壺井繁治诗集》（东京：真理社，1948）；引自 Prange 文库中的标注本。遵照要求修改之后，1948年7月诗作得以出版。
- 27 转引自 Samuel (1988)，p. 177。审查官还查禁了栗原贞子的一首谴责“所有战争”的兽行的力作；参见 Samuel (1982)，pp. 11–12。
- 28 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pp. 52, 116, 118, 140；Hopewell 前引文，p. 20；Mayo (1984)，p. 301。关于1947年的交锋，参见 Paul Vincent Miller, “Censorship in Japan”, *Commonweal*, vol. 46 (April 25, 1947)，pp. 35–38，以及 Imboden 在

- 6月13日那一期杂志上的回应 (pp. 213 - 215)。Miller 还列举了审查私人通信的例子，并引述了日本人的谴责：“自由与和平”的说教者却做这样的审查是伪善。
- 29 Spaulding 前引文，p. 9；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 196。实际的审查多有疏忽，对电影和照片的审阅中也有漏网之鱼。在影像资料中的确可以发现吉普车、英文标记和占领军人员，但是极为罕见。
- 30 此漫画在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中有提及，p. 52。这首川柳引自 Prange 文库。
- 31 Coughlin 前引书，pp. 52 - 53。
- 32 收入古川《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pp. 168 - 169。诗的作者是山之口貌。
- 33 参见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p. 51；马场恒吾的文章受命从1948年8月的《中央公论》上删除，参见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 21。
- 34 参见 Rinjirō Sodei, “Satire under the Occupation: The Case of Political Cartoons”, Burkman (1988), pp. 93 - 106, 以及笔者对此文的评注，pp. 107 - 123。
- 35 对这3幅遭审查漫画的描述，参见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pp. 137 - 139。
- 36 这4幅天皇题材的漫画，收录于 Sodei, pp. 104 - 105。
- 37 Klaus H. Pringsheim, “Wartime Experience in Japan”, 1995年10月 National Archives 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举办的 “Violent Endings, New Beginnings” 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未发表。
- 38 Russel Brines, *MacArthur's Japa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8), pp. 246 - 249。
- 39 Sodei, pp. 96 - 97；从《VAN》杂志上删除的3幅漫画收入该论文，p. 103。
- 40 《サザエさん》于1946年4月22日的《夕刊フクニチ》上初次登场，1949年12月转移到《朝日新闻》的夕刊上发表。《あんみつ姫》是《少女》杂志的连载漫画。亦可参照1990年11月23日《朝日グラフ》的短评。手塚治虫极其多样性的全部作品，皆收录于制作精美的展览目录《手塚治虫展カタログ》（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朝日新闻社，1990），并附有详细介绍和日英双语的分析评论。占领初期最受欢迎的连环漫画是日文版的 *Blondie*（《金发女郎》），作者为美国漫画家 Chip Young。1946年6月2日开始在《周刊朝日》上刊载，后来转移到《朝日新闻》朝刊上发表。*Blondie* 漫画与好莱坞的电影一起，对日本民众的“美国”想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日本民众想象的“美国”，是一个冰箱里塞满食物、住宅里满是神奇的家用电器的富足国家，家庭主妇们为了购买迷人的帽子一掷千金，赚薪水的丈夫们尽管可能不太走运，但照样开得起汽车、买得起房子，甚至连孩子们和宠物也不必承受家长权威的压迫。占领期间，出版了6册 *Blondie* 漫画集单行本。这扇可以窥见美式消费生活的诱人窗口，也成了学习英语会话的颇具魅力的启蒙读本。漫画的对话框中换上了日文，并在下方标注英文原文。研究政治的象征符号的学者，可能会发现以下事实的重要意义：1951年麦克阿瑟被召回之后，《朝日新闻》几乎立即停止在朝刊上刊登 *Blondie*，而替换上了《サザエさん》，后者此前一直连载在地位较为次要的夕刊上。
- 41 引自 Sodei, p. 99。清水崑描摹吉田茂的漫画，收入其《清水崑画 吉田茂讽刺漫画集》（东京：原书房，1989）。
- 42 古川纯的重要论文《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收录了1946年1月至1949年末正式的审阅制度结束期间《改造》杂志受审查的部分。

- 43 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p. 14；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p. 103。
- 44 Hopewell 前引文，pp. 61, 63；Rubin 前引文，pp. 87-88（引述大日向葵对麦考伊兵营的回忆，初次发表于1946年8月的《新潮》）。
- 45 Hopewell 前引文，p. 59；亦参见古川《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pp. 143, 151, 153, 177。
- 46 木本《杂志で読む战后史》，pp. 16-17；古川《杂志〈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p. 143；Hopewell 前引文，p. 58。
- 47 皆引自 Hopewell 前引文，pp. 60-63。
- 48 Hirano, *Mr. Smith Goes to Tokyo* 是关于占领期电影的基本参考文献。她（平野共余子）对占领下电影自由化的条分缕析而又基本肯定的评价，在 Hirano (1988) 一书中有准确表述，pp. 141-153。亦参见岩崎昶《日本现代史大系・映画史》，第7章；Iwasaki (1978)，pp. 302-322；今村昌平等编《讲座日本映画 第五卷 战后映画の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87）；佐藤忠男《日本の映画——裸の日本人》（东京：评论社，1978）；佐藤忠男《黑泽明の世界》（东京：朝日文库，1986）；Joseph L. Anderson 与 Donald Ritchie, *The Japanese Film: Art and Indust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增订版，第9章。
- 49 被销毁的日本电影清单，参见前引之 General Headquarters, *Theater and Motion Pictures*, "Annex No. I"。
- 50 黑泽明对战争年代及战后初期极其简短的回顾，见黑泽明著、Audie Bock 译，*Something Lik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82)。对黑泽明全部电影的缜密分析，参见 Donald Ritchie 的权威著述，*The Films of Akira Kurosaw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修订版。
- 51 这一插曲，在 Hirano (1992) 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记载；Hirano, "The Japanese Tragedy: Censorship an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41 (May 1988): 67-92；古川纯，《占领下のマスメディア統制——〈日本の悲劇〉の上映禁止をめぐって》，《东京经大学会志》122号（东京经济大学，1981年10月），pp. 200-238。有关亲历者的观点，参见 Iwasaki (1978)，pp. 314-322。龟井文夫身后有简短的“自传”出版，主要是其生平材料的辑录，见《たたかう映画 ドキュメンタリストの昭和史》（东京：岩波新书，1989）。
- 52 Hirano (1992)，p. 135。
- 53 古川《占领下のマスメディア統制》，pp. 236-237；Hirano (1992)，p. 136；Iwasaki (1978)，pp. 314-318；龟井《たたかう映画》，p. 117。
- 54 日映摄制《日本の悲劇》的费用为557000日元，在当时是一笔巨资。参见 Etō (1982)，p. 15；Hirano (1992)，pp. 140, 143。
- 55 今村等编《讲座日本映画 第五卷 战后映画の展开》，p. 101。《战争と和平》的片名，标准的英文译法为 *Between War and Peace*；按照字面的翻译更简单，正如托尔斯泰的名作：“War and Peace”。对审查《战争と和平》一片的详尽研究，参见 Hirano (1992)，pp. 54-55, 172-175；岩崎昶《日本现代史大系・映画史》，pp. 228-231；Etō (1982)，pp. 12-16。江藤的论文也引述了此处所引用的 CCD 的一些重要的备忘录，但有时却未能发现备忘录中提议的某些删节，实际上并未强制执行。格里菲思的 *Enoch Arden* 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电影，胶片长度为双片盘

(two reels), 而在此之前的美国电影皆为单片盘 (single reel) 影片。

- 56 1952年6月山本嘉次郎的回忆, 引自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 196。Hirano (1988), p. 145。小津安二郎的影片《晚春》中, 有一句台词抱怨东京“到处都是烧毁的遗迹”, 被改成了“到处都是这么脏”。尽管《戦争と和平》遭受到审查,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竟然有那么多美军空袭东京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
- 57 例如, 参见 Mayo (1984), pp. 308 - 310, 313 - 314; Coughlin 前引书, pp. 81 - 84;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 13, 125 - 128。
- 58 关于《赤旗》, 参见 Spaulding 前引文, p. 8; Coughlin 前引书, p. 106; Mayo (1984), p. 315;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 274。Brown 玩弄审查手法的例证, 参见 Prange 文库所藏《思想の科学》1947年4月号上有关审阅制度的对谈。
- 59 Mayo (1984), pp. 307, 318 - 319。
- 60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253 - 257; Hidetoshi Katō, *Japanese Research on Mass Communication: Selected Abstracts*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 pp. 95 - 96, 书中概述了《新闻研究》215号(1969年6月)上新崎盛晖的文章。有关被占领下的冲绳的审阅制度, 参见门奈直树《冲绳言论统制史》(东京: 现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 1970)。由于美国对冲绳的隔离统治, 本章(或者所有关于“被占领日本”的审阅制度的日方研究)所举实例或统计数据, 皆未涉及在冲绳本土发生的更为严酷的压制情形。参照奥泉《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 p. 529。
- 61 春原《占领検閲の意图と実態二》, pp. 94 - 95; General Headquarters, *Freedom of the Press*, pp. 27 - 28。1949年8月, 大阪的一位朝鲜人编辑 Kim Won Kyun 被判服5年劳役后被驱逐出境, 原因是他控告美军在朝鲜的伪大选前杀害反对派政党成员。1949年9月, 另一位朝鲜人编辑 Euan Muam 以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两年。第三起案例最为著名, 也是发生在同年9月, 案件涉及一位日本编辑。东京的通信社編集局长森岡七郎被判服两年劳役, 罪名是转载塔斯社对英国在马来亚的暴行、美国迫害共产主义者以及美国将日本变为在远东的军事侵略基地的报道。
- 62 “Magazines To Be Retained on Precensorship”, 1947年11月26日。CCD 的这一基本文件称, 这28份刊物仍旧被指定为事前审查的对象。此文件收录入奥泉《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 pp. 512 - 525。
- 63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101 - 102, 104。
- 64 Spaulding 前引文, pp. 3 - 4; Mayo (1988), p. 61; 古川《年表——占领下の出版・演藝・放送検閲》, pp. 242 - 246; 古川《雑誌〈改造〉に見る占领下検閲の実態》, pp. 154 - 155。亦可参见 Coughlin 前引书, 第七、八章; Hirano 前引书, 第六章。1947年12月被指认为“极左”刊物的26份期刊, 在占领期的头两年, 曾经遭到至少1280处的删节, 70篇文章被查禁; 数据源自 CCD “Magazines To Be Retained on Precensorship”, 奥泉《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 pp. 512 - 525。
- 65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 18。
- 66 平野和信夫的论文, 被从平野义太郎、信夫清三郎、木村健康、饭塚浩二《日本民众革命の課題》一书中删去。此书是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预定出版的《东洋文化讲座》的第一卷。关于农地改革的左翼批判不被容许的例证是, 1847年6月, 须乡登世治的《农村はどうなるか——农村改革法の解決》(中央大学

出版部)一书,被要求进行多处删节。这两份注有审阅标记的文本,皆收藏于 Prange 文库。

- 67 古川《年表——占领下の出版・演藝・放送検閲》, p. 250; Coughlin 前引书, p. 106。
- 68 Rodger Swearingen 与 Paul Langer, *Red Flag in Japan: Internatioan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 - 1951* (New York: Greenwood, 1968), pp. 209 - 212。
- 69 关于 GHQ 向日本新闻界施压、要求无条件支持美国朝鲜战争立场的代表性回顾, 参见长谷部忠《占领下の新闻》, 《〈周刊朝日〉の昭和史》(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89), 第二卷, pp. 43 - 44。
- 70 General Headquarters, *Freedom of the Press*, pp. 151 - 157; GHQ, *Theater and Motion Pictures*, p. 51; GHQ, *Radio Broadcasting*, p. 49;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301, 315, 335; Mayo (1984), p. 317。
- 71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302, 309 - 311; 今村等编, 《讲座日本映画 第五卷 战后映画の展开》, pp. 21, 83 - 84。
- 72 例如, 参见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323 - 324。
- 73 Iwasaki (1978), pp. 304, 317 - 318; 佐藤《日本の映画——裸の日本人》, p. 116; 松浦《占领下の言论弾压》, pp. 349, 354 - 355。